

#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 “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

## ——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胡义成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历史学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其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为陕北黄帝陵的墓主,这种情况彻底改变。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质变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质变突破。本文将在此前相关拙论的基础上,聚焦黄陵墓主为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从而证明杨官寨遗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

[关键词]黄陵墓主;“黄帝都邑”;西安杨官寨遗址

[中图分类号] K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193(2016)04-026-09

杨址发现和关于它是“黄帝都邑”的研究

西安泾渭交会处的杨址于2004年出土,初期《考古报告》已于2011年在笔者主编的相关论文集集中公开发表。<sup>[1]</sup>它是面积80余万m<sup>2</sup>且距今约5000—6000年的超大型史前遗址,其中包括24.5万余m<sup>2</sup>且距今约5500年以上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以及出土陶器等显示与豫西、晋南同属一个文化区。严文明先生为首的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认为,它是我国“目前所知面积最大的庙底沟时期唯一的保存较好的大型环壕聚落”,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sup>[2](P318)</sup>。但考古界当时在长达七年时间里,并未把它直接和黄帝相联系。<sup>[3]</sup>

笔者于2010年看到尚未发表的杨址初期《考古报告》后,相当吃惊于它即“黄帝都邑”,甚至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这一判断。鉴于民族有“三要素”,而“祖源认同”系其首项;“黄帝都邑”的确认,

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升意义重大,故思考再三,终于下定决心,撇开其它研究课题,在此深耕一下。于是,根据《史记》中《封禅书》和《孝武本纪》关于黄帝“荆山铸鼎”的明确记载,参考中原聚落考古成果,遂公开撰文编书首先明确提出,距荆山很近(实为一地)的杨址即“黄帝都邑”<sup>[4]</sup>。其“三重证据”(考古发掘,权威文献,民俗)相当咬合确凿,故石兴邦先生等陕西考古学者遂加认同。<sup>[5]</sup>此后,陕西省政府接受石兴邦先生、杨址考古主持者王炜林先生和笔者等联名建议,于2012年决定把杨址建设成“黄帝文化核心展示区”,目前正在实施。从提出杨址即“黄帝都邑”的判断至今,未见公开发表的不同意见(当然,仍有学者私下并不认同)。2016年清明节前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举办以“黄帝时代”为名的杨址等考古成果展,也说明陕西考古——历史学界已经逐渐接受杨址即“黄帝都邑”的论断。2015年,

\* [收稿日期]2016-05-12

[作者简介]胡义成(1945-),男,陕西凤翔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陕西省哲学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史前史与文化哲学。

[通讯地址]西安市含光路南段177号,E-mail:huyec405405@126.com.

笔者又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设立“国家公祭”的公开讲话,根据《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孝武本纪》、《封禅书》关于杨址黄帝死后葬桥山的明确记载,撰写了决策咨询建议《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

对本文而言,笔者上述相关成果的有关观点包括:

一、西安荆山距杨址约 10 公里,两者实为一地。当史念海先生把雍州“荆山”锁定为西安荆山时,<sup>[6]</sup>《史记》的《封禅书》和《孝武本纪》关于黄帝“铸鼎荆山”的记载,实际表明杨址就是“黄帝都邑”。其周边渭河流域有近千处庙底沟文化遗址,包括凤翔水沟达百万 m<sup>2</sup> 的超大遗址及彬县、陇县、华县庙底沟文化大遗址等,故其聚落群已具初级文明结构。<sup>[7]</sup>至少在考古发掘、权威文献和荆山民俗三重含义上,它均符合“黄帝都邑”特质。

二、在中国史前史研究中,张光直先生对陶祖作为男权社会标志的强调,很值得注意。杨址出土陶祖证明,它作为男权社会而在文明进化阶次上先进于辽西女神庙代表的红山女权文化遗址,同时也早于史前良渚和山东龙山等文化,且是豫地诸黄帝遗址文化之源,故应按“文明源头‘初级阶段’论”,判其为中国文明“‘首源’象征地”<sup>[8]</sup>。

三、近年考古界在否定“关中文明一元论”后,由苏秉琦先生和张光直先生倡导流行的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说”,应按“否定之否定”,完全回归“多元一体”下的“中原是中国文明起源核心区”理论。<sup>[9]</sup>石兴邦先生、严文明先生、许顺湛先生、陈星灿先生和张天恩先生等对“中原核心区”文明先进性的强调,契合最新考古成果,是正确的。以今例古,甚至把史前关中视为荒蛮之地,或无视杨址而把关中及西安从中国文明起源地图上删去,均不妥。在中原,陕豫“黄帝‘国祭’”地点之争,应摆脱“省域意识”干扰,以科学理性化解,包括彼此应承认对方均存“黄帝都邑”且与其它相关地方一起联合以“黄帝文化遗址”区“申遗”。<sup>[10]</sup>今后中国对内对外历史教育和宣传,均应以陕豫黄帝遗址群和红山文化遗址群等为主据,统一于“中国文明五千年”口径。

四、《史记·封禅书》“黄帝郊雍”记载以及杨址黄帝时祭器出土,表明《封禅书》关于史前中国宗教文化的记载,以及黄帝时期“巫王一体”、“以祀为礼”的文明特质,有待学界加深体认。<sup>[9]</sup>陕豫黄帝遗址群潜藏着中国文明源头的许多奥秘,不

能再用邵雍易学推论黄帝纪年。杨址显示黄帝时代以及西安“古都史”最早可能距今 5500 年以上。中国和西安文明史,有待学界重写。

五、杨址环壕“西门”出土的“镂空人面饰覆盆状陶器”(拙著戏称之为“倒扣花盆”<sup>[11]</sup>),是全国仅有的一件出土于“黄帝都邑”中的神秘祭器。鉴于当时可能是“巫王一体”,故它也可能是黄帝或其“近臣”使用过的祭器,是极其珍贵的中国最高级文物之一。联系《史记·五帝本纪》关于黄帝“迎日推策”,和《史记》的《封禅书》、《孝武本纪》关于“黄帝‘郊雍上帝’”的记载,可知此位黄帝在世时,杨址一带庙底沟文化聚居区崇拜日神且以之为祖先的仪式很隆重。《国语·晋语》说“少典”生炎黄二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段话对应的史前史实很可能是,黄帝族最早是来自银川的“萨满”经陇东崆峒山沿泾河谷入关中时逐渐形成的关中同时期庙底沟文化族群<sup>[11]</sup>(其对应的考古大遗址是杨址及沿泾河谷的彬县大宫殿遗址等<sup>[7]</sup>),黄帝的姬姓是对“泾河”之“泾”字的转音,<sup>[7]</sup>此姬姓很可能是后世关中周人对自己同样经历的“得姓”附会;炎帝族最早则是沿渭河谷逐渐形成的庙底沟文化族群(其对应的考古大遗址是均有“三合土”地面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和陕西凤翔水沟遗址等<sup>[12](P120)</sup>),其“姜”姓,按邹衡先生之见,则可能源自陕西凤翔的姜水;<sup>[13](P1)</sup>而丁山先生说“少典”即日神,<sup>[14](P408)</sup>炎黄两族都是关中崇拜“日神”者,曾经在军事上结成“兄弟”联盟“以相济”,后来分别从关中西部和中部向东发展且最终通过战争融合为一,等等。解放前的徐旭生先生,<sup>[15]</sup>解放后的张岂之先生<sup>[16]</sup>等,都论说过关中炎黄二部落均有一部向东发展的往事。显然,“两河流域”埋藏着“炎黄文化”最古老的秘密。

六、《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孝武本纪》、《封禅书》关于杨址黄帝死后葬桥山的明确记载,是我国应实施“黄陵‘国祭’”的主要考古——历史学证据。网上有豫籍人士一再说,“黄陵祭祀”仅根据“黄帝铸鼎飞升”的神话,并无考古学证据支持。今天看,这种责难已经不攻自破。不过,此前的拙论对黄帝死后葬桥山只是提出论点,略为申说,并未仔细论证,本文之撰即为补此遗憾。

七、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首先碰到的是“国祭”地点选择标准问题。依拙见应立五条

标准,一是鉴于黄帝不是一个人而是对中国史前陕豫一带多位原始部落联盟首领的泛称,故只能选择祭祀其中的前辈黄帝;二是其考古——历史学证据必须确凿无疑;三是其文献证据必须具有权威性且必须与考古——历史学证据完全无隙咬合;四是其民俗普及证据必须确凿无疑;五是必须在传统的“国祭”地点(由于对“国祭”中“陵祭”——“庙祭”理解不同,应以最早的皇帝祭黄且后来“国祭”使用时间最久之地为准)。而在陕豫诸地比较中,只有杨址符合这五条,包括在考古时序上和文献记载中它均早于河南诸黄帝遗址,且从汉武帝开始一直是“黄帝‘国祭’”地。当然,这并不排除,黄陵之外的其它诸黄帝遗址也可以“省祭”或“市祭”等名义祭祀黄帝。

对这些见解,至今未见到公开发表出的不同意见。如果说,陕西省决策层采纳相关学者联名建议,是官方对这些见解主体的某种认同,那么,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以黄帝时代为名举办杨址考古成果展,也表现出陕西学界对这些见解主体的逐渐认同。

#### 黄陵墓主即杨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史记·五帝本纪》明确说,“黄帝崩,葬桥山”。而《史记》的《孝武本纪》和《封禅书》则借西汉“方士”公孙卿转述其前辈“方士”申公之言,进一步细化说,黄帝于西安荆山铸鼎成功而乘龙“飞升”时,当时黄帝“小臣”等人“悉持龙鬣,龙鬣拔,堕黄帝之弓”;后来,汉武帝“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他问人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手下回答说,“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对这个掺和了迷信色彩的故事虽不可全信,但杨址出土迫使我们不可完全不信它;至少,它告诉我们,确认杨址是“黄帝故都”与在黄陵“国祭”黄帝是一件事情的不同侧面,因为,陕北桥山黄陵墓主,即西安杨址族群盛期黄帝,这应当可信。

此前,由于杨址未出土,人们都把黄帝于荆山铸鼎成功而乘龙“飞升”视为完全的“神话”,故古今均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的考古——历史学主证,包括司马迁《史记》也未在《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荆山铸鼎”故事,而是在《孝武本纪》和《封禅书》中借“方士”公孙卿转述其前辈“方士”申公之言,说出“荆山铸鼎飞升”故事的,看来他也并不太相信这个迷信色彩很浓的往事。《封禅书》结尾明称此系“用于鬼神

者”,仅供“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至于对那位阉割太史公的汉武帝,《孝武本纪》也并不认真尊敬,讽喻明存。故聚焦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说明杨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还应斟酌再三,反复推敲,再勘文献,参以旁证,力求此主证真实确凿,万无一失。

一、顾颉刚先生曾认为,《史记》在为黄帝立传时主要参考了战国儒家的典籍《五帝德》和《帝系》<sup>[17](P86-112)</sup>。其实,战国儒家插手定稿的《山海经》<sup>[18]</sup>也有关于黄帝在雍州“立国”的记载,可与《孝武本纪》和《封禅书》中的道家记载互为印证,只是《史记·大宛列传》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所以《史记》就漏掉了这条可贵记载。

《山海经·海内经》说:“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这一记载十分重要。它显然是接过了《尚书·禹贡》关于“黑水西河为雍州”的说法,开头就点明了黄帝立国的地方在雍州。因为,其中“黑水”即晋陕分界处之黄河,<sup>[19](P738)</sup>“流沙”实即《尚书·禹贡》之“西河”,此两条河围合之处恰即雍州,雍州核心区正是今西安一带。其实,《史记》的《封禅书》和《孝武本纪》关于“黄帝郊雍上帝”的记载,虽其“雍”字字面意似指关中凤翔,但鉴于凤翔水沟已出土三合土地面的庙底沟文化大型遗址,其三合土地面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属同一文化,<sup>[7]</sup>故可推知当时凤翔属于炎帝势力范围,与炎帝同时的黄帝不可能离开杨址跑到凤翔祭祀上帝,且杨址已出土当年“黄帝郊雍上帝”仪式的祭器如“倒扣花盆”,故“黄帝郊雍上帝”中的“雍”字,实际指西安一带。此义也与成书在前的《尚书·禹贡》所记“雍州”本义的重心相符。

尤令我感兴趣的是,《山海经》在此还把黄帝所立之国称为“朝云之国”和“司彘之国”。结合《史记·五帝本纪》关于黄帝“迎日推策”的记载,以及关于“黄帝郊雍上帝”的记载,可以设想,所谓“朝云之国”,实指黄帝在西安杨址举行“迎日”仪式而常见旭日东升、朝霞满天的美丽景色,意味着杨址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聚居区的崇拜日神的宗教仪式相当发达。由此也可理解《史记·五帝本纪》所讲黄帝时“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的基本含义了,它说明当时黄帝周边的主要“官员”,皆为举行“迎日”仪式中的各类各级“巫师”。另外,结合杨址出土的动物遗骨中猪骨占比颇大的考古发

现,<sup>[20]</sup>可以设想,所谓“司彘之国”,明显指当时杨址一带人工养猪之业相当发达,进一步印证着“养猪是中国史前畜牧业的特点”<sup>[16]</sup>,说明杨址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聚居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已经直逼文明门槛。故《山海经》这种记载还填补了《史记》相关记载的不足,从文献角度进一步印证了杨址作为“黄帝都邑”的可靠性。

二、关于黄帝葬桥山的记载,《史记》实际给出了彼此矛盾的两种说法。其一是“黄帝崩,葬桥山”,很干脆明确;其二是说黄帝在杨址化作仙人“飞升”,仅其衣冠葬在桥山。鉴于在为黄帝立传时司马迁主要参考了儒家典籍,而儒家一般是“不语怪、力、乱、神”的,<sup>[21]</sup>故可知他把“黄帝崩,葬桥山”六字写在《五帝本纪》中,暗示其可信,而把黄帝在荆山铸鼎后化作仙人“飞升”之事,借方士转述而记在别处,意在仅保留这个传说。本文也认为前者可信,但并不认为后者全不可信,杨址出土证明其也有可信处。当年顾颉刚先生因为黄帝“飞升”故事不可信,而把“黄帝荆山铸鼎”故事也一概否定,进而否定黄帝及其文明时期的存在,<sup>[22](P320-349)</sup>显然是严重的学术误判。当然,这其中还需要大致厘清,荆山杨址黄帝史实,后来是怎么逐渐变为神话的?

现在看,在整塑黄帝形象的春秋战国时期,讳言黄帝离世,把其离世说成“飞仙乘龙”,是包括儒道两家在内的中国知识界的普遍说法。其政治目标是整塑出一个全民认可的“超人”式祖先,凝聚全民族走向统一。《史记·五帝本纪》所据的《五帝德》,就记载着孔子说,黄帝平时即“乘龙扈云”<sup>[17](P89)</sup>。《庄子·大宗师》则提出,黄帝“得道”后能“登云天”。至于几乎与《史记》同时的《列仙传》,则进而引“仙书”说,“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鼎成,有龙垂胡鬣下迎,帝乃升天。”又说,黄帝卒,“还葬桥山”<sup>[11]</sup>。这与《封禅书》和《孝武本纪》相关记载如出一辙,只是把后者的“荆山铸鼎”换成了“铸鼎于荆山之下”,进一步显示出杨址的精确位置,为我们把杨址确定为“黄帝都邑”又添了一个确凿的文献证据。看来,黄帝在杨址故事的骨架,主要是通过附着了“乘龙升天”等迷信色彩的道家“仙书”(《封禅书》和《孝武本纪》名之为“鼎书”)流传下来的,其中,儒家完全不知的杨址都邑史实,与“乘龙升天”等迷信密不可分地混杂在一起。尤值得注意的是,《列仙传》还补充了《史记》“黄帝崩,葬桥山”六字漏掉的“葬桥

山”原因:“还葬”,即是黄帝“魂归故里”。这是确定黄陵墓主即杨址盛期首领的又一个关键点。

鉴于杨址黄帝族群最早系来自银川一带的“萨满”,由银川一带沿清水河南下,经甘肃平凉崆峒山,又沿泾河谷进入关中,在彬县还留下了200m<sup>2</sup>的“四坡重檐式原始殿堂建筑”。<sup>[7]</sup>而今黄陵距彬县遗址较近,显然,如《列仙传》所言,黄帝移葬黄陵的真正原因是“归葬”。这也进一步印证了黄帝族源自北,因为彬县—黄陵一带庙底沟遗址群(见下述),很可能是此位黄帝或其族群进入关中后的一个聚落群所在,此位黄帝出生在该地,所以他在死后要远距离地“归葬”于故里,故可认为“黄陵即黄帝故里”。目前杨址已有成批墓葬出土,“魂归故里”也是作为族群首领的黄帝与族群一般人葬仪有别之处,说明当时杨址社会分层显化。

三、黄陵墓主即杨址首领,除了从杨址方面说事外,还应从陕北黄陵方面探寻证据。

从黄陵方面探寻证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杨址如今已有群葬墓地出土的条件下,剖开黄陵进行DNA比对以及进行其它科技考古等,以便科学地确定黄陵墓主是否杨址首领。但此思路行不通。一是似涉嫌“挖祖坟”,在中国绝对不能实施。二是不符合国家文物局关于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禁止发掘的规定。三是即使实施,也未必会真有成效,因为黄帝时代不存在权力向亲子单传的制度,杨址与黄陵之间难以进行亲属间的DNA比对。四是当时葬制无椁且不封不树,<sup>[23]</sup>故墓主骨殖实际早已不存,无法比对。于是,我们只好在黄陵周边的史前遗址中寻找旁证。

据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显示,黄陵周边和黄陵县境,共有新石器时代遗址48个,大部为仰韶文化遗址,其中有19个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即与杨址同时期者。加上其邻彬县,又已出土了前述黄帝族宫殿遗址,这说明黄陵——彬县一带“是仰韶文化中后期的一个中心地带”<sup>[24](P355-356)</sup>。于是,黄帝“魂归故里”就具备了考古学上“故里”的“前件”。

#### 四、对其它“黄帝陵”的简单述评

与《史记》作者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汉武帝到今陕北黄陵县的黄帝陵祭黄,本身就是对“桥山”地望的权威性确认。汉武帝之后对“桥山”地望的不同理解,在权威性上均难比肩汉武帝。但从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看,除了今陕北黄陵县之黄帝陵

外,中国其它地方还有一批别的“黄帝陵”,如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荆山黄帝陵、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石家湾乡高柏山黄帝陵、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五顷塬乡黄帝冢、北京市平谷区山东庄镇黄帝陵、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温泉屯乡黄帝陵、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桥山黄帝陵、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张山子镇黄帝陵、河南省鹤壁市淇县轩辕坟等。其中有的是由于对“桥山”地望的不同理解引起,有的则源自对黄帝历史的不同看法,主要特点是仅凭文献证据而缺乏考古证据支持或其考古证据不确凿;有的是既无考古证据支持,也无文献证据支持,仅有民俗流传,反映着各地民众对黄帝的普遍景仰,就“没有必要去论真假是非了”<sup>[25](P455)</sup>。这里仅简说两点。

1、沈长云先生在把陕北石峁遗址确定为“黄帝部族居邑”时,提出的一个证据,就是真正的黄帝陵即今黄陵县北边的延安市子长县石家湾乡高柏山黄帝陵;子长黄帝陵与陕北神木县的石峁遗址颇近,共同显示出当时“黄帝部族居邑”聚落特征。<sup>[26]</sup>王巍先生则“从时间和地理位置的角度考虑,认为对‘石峁古城黄帝说’应持谨慎的态度”<sup>[27]</sup>。卜工先生进而批评道,“没有史料和通史教材说黄帝活动的年代如此接近夏代”,故它应“与黄帝无涉”<sup>[27]</sup>,一语中的。不过,“子长黄帝陵”说其实源自唐代撰《史记索隐》的司马贞,学界古今认同“桥山妫州说”和“桥山阳周说”者颇多,对妫州、阳周地望异解颇多。关键是“子长黄帝陵”说还缺乏汉武帝认定的权威性,包括它迄今缺乏精准的权威文献和考古学证据,故难为凭。

2、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荆山也有黄帝陵。从灵宝西坡墓地考古情况看,其庙底沟文化属性与杨址同类,距今约5300年左右,比杨址环壕最晚年代迟200年左右,显系杨址黄帝族群经华县户泉遗址<sup>[28](P278)</sup>等东移,且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果。由此可以推想,其地阳平镇的荆山“黄帝铸鼎原”,是把西安荆山“黄帝铸鼎原”移用于该地的表现。何况,从《史记》关于“黄帝荆山铸鼎”的文字看,此荆山应是雍州之“北条荆山”,并非《尚书·禹贡》所说豫地之“南条荆山”<sup>[19](P745)</sup>,故其移用西安荆山之迹明显,仅可视为黄帝族移民对故土杨址怀念的表达,其地“黄帝陵”显系后人伪托,未可据以另立“黄帝陵”。

关于“炎黄时代”具体时段的推想

自从孙中山先生任中华民国总统后下令“阳

历”以黄帝纪元后,黄帝年代一直是个政界和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时,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宋健先生就说,“辛亥革命时期倡议的黄帝纪元是否能肯定?轩辕黄帝的年代是否能确定?炎黄子孙们寄希望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能做出科学结论”<sup>[29](P15)</sup>。在此前后,毛泽东主席和习近平主席,都应和着孙中山1912年“中华开国五千年”的赞词,一再说“中华文明五千年”。现在杨址出土并被识别,也为圆国共两党和全国民众“中华文明五千年”之愿提供了考古学证明。现在看,推想基于考古的“炎黄时代”起始年份,也提上了日程。

一、推想“炎黄时代”起始年份的两个附带性说明

1、从民族学角度看,原始部落首领的称号普遍具有沿袭性,在一些强大的原始共同体中更是如此。其典型例证之一,是北美印第安人的易洛魁部落。其中,“每一位首领职位的名号,也就成了充任该职者在任期内的个人名字,凡继任者即袭用其前任者之名”<sup>[30]</sup>。鉴于张光直先生已发现史前地球上即存在“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sup>[22](P404)</sup>,复鉴于笔者根据宋耀良先生的岩画研究,已论证过关中黄帝族最早即与北美的玛雅文化同源者萨满进入关中,故可以认为北美易洛魁部落对首领的称呼习惯,对关中黄帝族也是适用的。“黄帝”应是对一批中原部落联盟领袖的通称。

本文此处对关中黄帝用“屈”字,是因为黄帝当时并非一个人,也不是“单传亲子”的“皇帝”,而是不时在协商中换届(即所谓“禅让”)的一批关史前部落联盟领导人。可以认为,炎帝族也是这样。

2、对“第一届黄帝”的确认。葬于黄陵的杨址黄帝,应是“第一届黄帝”,因为,所有杨址黄帝中,只有他死后“归葬”杨址之外的“故里”,而其他黄帝均无“归葬”之事,这说明只有他是黄帝族群进入关中后在别地领导并等待杨址最终建成后正式进驻杨址中的第一人;杨址“都邑”建成对该族群是一件绝大喜事,表示其“古国”确立,故族人尊其为黄帝,其成为“第一届黄帝”,此后其继任者也均被如此尊称。可以设想,杨址从距今6000年即开始有人生活,他们最早应当是附近半坡、姜寨一带的关中土著;后来,已进入彬县的黄帝族群派人到这里试探,并逐渐加多试探人数且大力吸收关中

土著文明成果如养猪和使用尖底瓶之类,经过很长时间,黄帝族群与关中土著完全融合,彬县指挥中心即开始谋划杨址开发建设。尽管这位“第一届黄帝”不是杨址早期建设的领导者,但他却是杨址族群盛期最劳苦功高的领袖,包括他领导黄帝族群把杨官寨“都邑”最终建成并很可能也领导了作为“古国”标志的杨址环壕(疑有城墙)聚落最后的修建冲刺(实际是为中国文明举行最早的奠基礼),大力推进以养猪为代表的农牧业跨越发展,同时制定“郊雍上帝”拜祭日神的整套仪规,使这个“古国”成为著名的“朝云之国”和“司彘之国”等等。人们用归葬黄陵的方式表示对其勋业的承认和景仰,就是对“第一届黄帝”的确认。其生活年代至迟在距今 5500 年前。

在中国考古——历史学研究中,确认“第一届黄帝”,是非常严肃而具重大文化意义的事情。本文作者才浅识拙,在这里仅是抛砖引玉,希望展开讨论而已。

当然,对“第一届黄帝”的确认并不等于对“炎黄时代”始点终点的确认。

## 二、推想“炎黄时代”年份

目前,对“炎黄时代”起始终点讨论的观点颇多,其中值的特别注目有:

### 1、“炎黄时代”始于六千年前说

鉴于炎黄大体同时并立于关中,而杨址北部环壕距今约 5500—6000 年,其南部陶窑等距今约 5000 年以上;同时鉴于许多文献记载黄帝族曾活动于豫地新郑具茨山,而据许嘉璐先生在 2015 年 11 月 9 日《光明日报》文章《国家祭拜的力量》说,具茨山史前岩画距今约 4850—3980 年(本文依许文取具茨山岩画年代中间值即距今 4500 年),这意味着,广义的“炎黄时代”在距今约 6000—4500 年之间,约 1500 年左右。这一理解基于群众史观,把早于“第一届黄帝”但已进入文明创造的杨址创始者们及早于“第一届黄帝”进入杨址的黄帝族领袖即族人均包括在内了。由此看来,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 25 讲》,其中说“约自前 4000 年起”即距今 6000 年起中国文明“迈开了文明起源的步伐”<sup>[31](P28)</sup>;“大约前 2600—前 2000 年左右”即距今 4600 年—4000 年,中国进入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后期”<sup>[31](P21)</sup>,是比较精确的。王巍先生则从“过程

论”出发而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也可概括为“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步、六千年加速、五千年进入、四千年过渡、二千年转型”<sup>[9]</sup>。看来,杨址和新郑具茨山正好应和着其中“六千年加速、五千年进入、四千年过渡”的阶段。这比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文明仅有两千多年历史<sup>[9]</sup>“长了”几乎三倍。

### 2、“炎黄时代”始于七千年前说

许顺湛先生则认为“炎黄时代”始于七千年前。<sup>[32](P33)</sup>如果考虑到作为关中凤翔水沟遗址(它应是关中炎帝文化的考古学对应物)文明之祖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它应是甘肃天水“伏羲文化”的考古学对应物。由于水沟遗址和大地湾遗址均现三合土地面,故可认定后者系前者源头)距今 8000 年一直延续到距今 5000 年,其中最主要的文化层距今约 7000 年,那么,我也认同徐见,即“炎黄时代”在距今 7000—4500 年之间,约 2500 年左右。作为战国著作,《庄子》形成于“三皇五帝”序列正式定型之前,其中《田子方》就有“伏羲(羲)、黄帝”的连称,它正好反映着“炎黄时期”源自伏羲而至于黄帝的本貌,故我也赞同许顺湛。可以认为,中央关于建立关天区的文件说,要把关中天水一带建设成“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也前瞻性地突现着中国文明的这种起源状况。天水大地湾遗址和关中杨址共同应和着王巍关于中国文明“八千年起步、六千年加速、五千年进入、四千年过渡”的阶段。

### 三、推想“炎黄时代”年份应服从考古新成果

在“炎黄时代”年代的确定上,由于人们对文献关于“少典”之子炎黄的理解“以后世‘兄弟’解释史前‘兄弟’”,加上当时杨址考古未出土,故误解不少。其中包括,南宋《轩辕黄帝传》力主黄帝距今差 6 年即 5000 年的观点<sup>[33](P31)</sup>,影响很大且至今不衰。孙中山先生当年以国家法令确认 1912 年为黄帝纪元 4609 年<sup>[22](P283-284)</sup>,以及于右任先生《黄帝功德纪》,也均是在其框架内增减年份形成的。目前,“炎黄时代”年份确定还有局限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等年份的现象,似也不足取。在我看,这种基于定义、文献或传说的“炎黄时代”年份认定,都得服从考古新成果。

### 作为“精神标识”的“黄帝陵”

“黄帝陵”的考古、文献和民俗根据的确立,并不等于“黄帝陵”即为“全真”。从历史真实的角度

看,“黄帝陵”三个字所含的“黄帝”和“陵”两个概念,都是虚构,并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标准。

### 一、“黄帝”称呼确是周人的虚构

我们承认中国中原史前史中有一批来自黄土高坡的部落联盟领袖,并不一定要承认他们确实在史实中被称呼为“黄帝”。“黄帝”作为名词和对中原史前史中一批来自黄土高坡的部落联盟领袖的称呼,确实是周人依当时帝皇形象的虚造。对此,当年“古史辩”学派的顾颉刚先生和丁山先生等均有大量论证,主要内容包括:

1、“黄帝”称呼“不但《论语》、《孟子》中不见,即很后出的《荀子》也未尝见”,连《史记·五帝本纪》也明说“《尚书》独载尧以来”<sup>[17](P87)</sup>;屈原“在作《天问》的时候,黄帝炎帝的神话还不曾传到楚国”,所以《天问》里也无黄帝炎帝。<sup>[17](P30)</sup>宗周的金文中也无“黄帝”字样。<sup>[14](P408)</sup>顾颉刚先生和丁山先生说的这些,均是事实。

2、“周代人心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春秋或战国时才有黄帝、神农”。<sup>[14](P439)</sup>丁山先生说的这些话也是事实。春秋或战国时的周人显然是按照自己的文明状况来想像史前中原部落联盟领袖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也由于史前中原部落的原始人究竟怎么称呼自己的领袖,包括其发音如何,对周人而言确是个谜。没有办法,他们只能以如此虚构存史。

3、从文献记载的“黄帝”词源看,“黄帝”最初即“‘皇天上帝’的别名”;最早说出“黄帝”一词者,是《逸周书·尝麦》,但其口气显然是春秋时代的,其目的是“用‘黄帝’代替‘皇天上帝’”<sup>[14](P439)</sup>。丁山先生说的这些还是事实。周人的“黄帝”一词,实际上已按“皇权”嫡传体制改铸了史前中原部落联盟领袖不时换届的本貌。

虽然“黄帝”一词是周人虚构,但它指称的史前中原部落联盟领袖们却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包括顾、丁在内的“古史辩”学派的学者们,从“黄帝”一词是周人虚构,走向完全否认史前中原部落联盟领袖们和他们代表的那段中国文明初创历史,甚至说周人所讲中原史前史全是“造伪史”<sup>[17](P296)</sup>,却是错误的。从方法论上看,一个事物的“名”与“实”并非绝对同一者,有的“名”虚而“实”也虚,有的则相反;不能认为“名”虚必然“实”也虚。“古史辩”学派在黄帝问题上,正是由其“名”虚而导出其“实”必然“无”的,至少在逻辑上不周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的这种

逻辑错误,无视他们揭明的“黄帝”一词确是周人虚构的事实。

### 二、黄帝有“陵”也是虚构

皇帝死葬于陵,是后世习俗,而史前黄帝时期的葬俗是“不封不树,丧期无数”<sup>[23]</sup>;“死不(得)用槨”<sup>[23]</sup>。在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从出土的商代妇好墓可知,商代贵族也不“起坟”而仅于葬处建“享堂”<sup>[34](P131)</sup>。周人最初很可能也是“不封不树”且实施“族葬”者。至今西周“王陵”并未发现,包括《史记·鲁周公世家》明说“葬周公于毕”,但周公墓至今未现。后来追记西周制度的《周礼》则说,当时包括国王在内的“族葬”,国王之葬也仅列于中,有较大“丘封”和种树较多而已<sup>[36]</sup>。降至战国,出土显示“中山国”国王夫妇和河南辉县贵族数墓并列,墓上建有“享堂”<sup>[34](P131)</sup>。《左传》记载,此时人们对国王之墓,有人已呼之为“陵”<sup>[36](P194)</sup>。凤翔县的秦公大墓,显示秦国国王已有较大之墓且上建“享堂”<sup>[37](P82)</sup>。后来秦统一六国后,在废除政治“分封制”的同时,也实际废除了周代“族葬”制,使官民“择地而葬”逐渐推广<sup>[38](P316)</sup>,且在战国国王陵墓体制基础上,不仅把历代国王之墓改建为“公陵”(秦惠文王)、“永陵”(秦悼武王)、“孝陵”(秦孝文王)等,<sup>[39]</sup>而且建成了中国历史上体量空前绝后的“秦始皇陵”。它使中国皇帝死后葬于陵寝成为规制,于是,“陵”也成为皇帝的身份象征。汉武帝之前的所有西汉皇帝,就建有长陵(刘邦)、安陵(刘盈)、霸陵(刘恒)和阳陵(刘启)。从中国这段陵墓史可以悟出,黄帝时期,并无“皇帝”及其死后葬于陵寝的规制,所以,《史记·孝武本纪》关于汉武帝到“黄帝陵”祭黄帝时,该处已有“黄帝冢”的记载,显示着两种可能。其一,随着“秦始皇陵”使“陵”成为皇帝的身份象征,当周秦之际有当地人在黄帝葬处一带营建了“黄帝冢”时,汉武就前往致祭。其二,“黄帝冢”可能是当时鼓励汉武前往致祭的西汉方士公孙卿等派人修建。由于杨址出土证明他们确实掌握着一些关于黄帝历史的确切信息,所以,所建“黄帝冢”之地望无错。无论那种情况,“黄帝”有“陵”,是一种历史虚构。

三、组成“黄帝陵”的两个概念,均是倚托某种“历史素底”而形成的虚构,故“黄帝陵”概念,也只能是倚托某种“历史素底”而形成的虚构概念。

四、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的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的定性说明,应当首先从民族凝聚和国家团结统一的角度思考“黄帝陵”问题,不能一味追求其符合百分之百的历史真实。目前,只要确证了“黄帝陵”具有杨址的考古学证据,就可以在“黄帝”只是中原史前部落联盟首位领袖的意义上,坚定地把它确定为“国家公祭”地点;至于“黄帝陵”概念本身是倚托某种“历史素底”而形成的虚构,应不妨碍把它确定为“国家公祭”地点,因为它首先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不能只从考古——历史学追求的历史真实性思考它。

习近平总书记所用“标识”一词很精确考究。“标识”原义即“记号”,如魏晋稽康《声无哀乐论》便说,“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sup>[40](P1280)</sup>。近世西方艺术设计学也有专业术语“标志”(logo,又译“标识”<sup>[41](P57)</sup>),原意指“狭义的符号”,它能“以精炼的形象代表或指称某一事物”,可分为象征性符号和指示性符号等。<sup>[42](P164)</sup>由此可知,习总书记首先视黄帝陵为表达中华文明精神的象征性符号或“象征性记号”,这种“象征符号”功能的形成并非无凭,而是主要来自考古学证据对中国史前中原发祥地部落联盟真实历史的确凿印证,但也不要要求作为“象征记号”的它直接就是历史本身,故不要求它百分之百符合历史真实。

从民族心理学看,中华民族团结心理由认知、情感和意志三部分组成;<sup>[43]</sup>“黄帝陵”在其中首先起着在认知上使各民族感知和理解大家“血浓于水”的爱国主义民族共源,从而在情感上达致团结互助和爱国主义,在意志上形成万众一心、对抗分裂、共圆“中国梦”的爱国主义效果。

#### 参考文献

- [1] 王伟林,等.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考古报告[A].石兴邦名誉主编、胡义成,孙兴华.黄帝铸鼎郊雍考辨与赋象——西安古都史新探[M].西安:西安出版社,2011.
-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给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关于杨官寨遗址的资料[A].胡义成,等.周文化和黄帝文化管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 [3] 王伟林,等.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考古报告;张天恩.荆山铸鼎地周围新石器时代遗址与黄帝文化[A].石兴邦名誉主编、胡义成,孙兴华.黄帝铸鼎郊雍考辨与赋象——西安古都史新探[M].西安:西安出版社,2011.
- [4] 胡义成.新探西安作为黄帝铸铜(鼎)地和“都邑”——兼论西安古都史当在5000年以上(上,下)西安社会科学[J].2011,(3).
- [5] 石兴邦《序言》[A].收于石兴邦名誉主编、胡义成,孙兴华.黄帝铸鼎郊雍考辨与赋象——西安古都史新探[M].西安:西安出版社,2011.
- [6] 史念海.释《禹贡》雍州“终南惇物”和“漆沮既从”——重读辛树帜先生《〈禹贡〉新解》后记[A].收于石兴邦名誉主编、胡义成,孙兴华.黄帝铸鼎郊雍考辨与赋象——西安古都史新探[M].西安:西安出版社,2011.
- [7] 张天恩.渭河流域仰韶文化聚落状况观察[A].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 [8] 胡义成.西安杨官寨遗址是中国文明“首源”象征地——中国聚落考古“三山一水”初步比较[J].长安大学学报,2012,(4).
- [9] 胡义成.再思杨官寨遗址的文化价值——兼论中国当代考古学思潮应按“否定之否定”演进[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 [10] 胡义成.西安是“黄帝故都”吗?——对三处考古学“黄帝故址”的简单比较[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8-13.
- [11] 胡义成.银川“萨满”进关中——关中黄帝族源探研[A].胡义成,等.周文化和黄帝文化管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 [12] 胡义成.关中文脉(上册)[M].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8.
- [13] 宝鸡市社科联.炎帝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 [14]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 [15]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
- [16] 张岂之.引言[A].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黄帝陵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 [17]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8] 胡义成.子夏定稿《诗经》于关中说[J].南通大学学报,2009,(1);胡义成.《伐檀》解[J].贵州社会科学,1981,(6).
- [19] 顾颉刚,刘起釞.《尚书》校释译论(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20] 王伟林,等.陕西高陵杨官寨环壕西门址动物遗存分析[J].考古与文物,2011,(6).
- [21] 论语·述而.
- [22] 胡义成,等.周文化和黄帝文化管窥(下册)[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 [23] 周易·系辞.

- [24]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黄帝陵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 [25] 霍彦儒.孺子文集(下册)[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 [26] 沈长云.再说黄帝与石峁遗址[N].光明日报,2013-04-15(国学版).
- [27] 魏永康.“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建构”学术研讨会简述[N].光明日报,2015-12-26(史学版).
-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灵宝西坡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29] 文史哲编辑部.“疑古”与“走出疑古”[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30] 杜勇.炎帝部落东进扩张中的重要区域[N].光明日报,2016-02-02(论苑版).
- [31]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 25 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32] 新郑市文化局.黄帝文化与黄帝故里拜祖大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
- [33] 朱恪孝,谢阳举.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
- [34] 潘谷西.中国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 [35] 周礼·春官·冢人.
- [36] 毛心一.中国建筑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 [37] 傅熹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建筑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38] 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 [39] 史记建筑卷赵世家.
- [40]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 [41] 陈正俊,等.设计概论[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1.
- [42] 尹定邦.设计学概论[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5.
- [43] 罗鸣春.民族团结心理的结构与功能[M].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2-22(6).

(责任编辑 郝银侠)

**Xi'an Yangguanzhai Site is the Main Archaeological Proof that Proves Huangling Worship is National Mourning  
——on the Owner of Huangling Tomb as the Leader of Ethnic Groups Who Lived  
in the "Yellow Emperor City" ——Yangguanzhai Site in their Heyday  
HU Yi-cheng**

(*Shaanxi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an, Shaanxi 710065*)

**Abstracts:** In studies of the Yellow Emperor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nobody seriously connects “Yellow Emperor City” with Xi’an; also nobody seriously sees the Yellow Emperor City in Xi’an as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of Northern Shaanxi Yellow Emperor Mausoleum. After Xi’an Yangguanzhai sit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Yang Zhi”) was unearthed and recognized as “the Yellow Emperor City”, and its flourishing age leader, namely, the first Yellow Emperor was recognized as the owner of Northern Shaanxi Yellow Emperor Mausoleum, this situation changed completely. This is a qualitative breakthrough not only in studies of culture of the Yellow Emperor, but also is studies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ased on my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wner of Yellow Emperor Mausoleum as the leader of ethnic groups who lived in the “Yellow Emperor City” ——Yangguanzhai Site in their heyday, namely, the first Yellow Emperor, and then proves that Xi’an Yangguanzhai Site is the main archaeological proof that affirms Huangling worship is national mourning.

**Key words:** the owner of Huangling tomb; “Yellow Emperor City”; Xi’an Yangguanzhai Site